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闫如山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001

【摘要】：本文聚焦“双一流”背景下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研究。通过解析政策内涵与学科需求，系统剖析当前培养体系在目标、课程、指导与评价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瓶颈，提出构建以“价值引领—前沿洞察—跨界协同—实践转化”（VFIP）为核心的四维融合培养模式，推动培养范式从“单向传授”转向“生态化培育”，旨在实现人才培养从“标准输出”到“创新种子”的范式转型，以期在设计教育创新与“双一流”建设实践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参考，推动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服务于国家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战略。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

DOI:10.12417/2705-1358.26.08.075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科技产业深刻变革，国家间竞争日益聚焦于人才与创新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承载着为国家战略需求培育一流人才、构建一流学科体系的重要使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转型。历史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历史，就是其研究生教育崛起的历史”^[1]，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整体高度与国家创新体系的竞争力。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并通过深化综合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人才与智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着重强调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机制。这些顶层设计共同指明：必须立足国情，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支撑作用，将其作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内容。在这一宏观导向下，艺术设计类研究生教育面临着更高标准与全新要求。

艺术设计作为融合人文底蕴与实践创新的学科，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肩负着驱动产业升级、塑造生活方式、传播文化价值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他进一步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2]基于此，在“双一流”建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系统

探索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全力营造有利于优秀艺术设计人才脱颖而出的育人环境和氛围^[3]，兼具紧迫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理论价值。

1 “双一流”战略与艺术设计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解构与时代要求

“双一流”建设的重点是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学术环境，持续创造新知识、培养高端人才、服务国家需要。该战略强调从追求指标转向营造生态，突出引领性、创新性和实际贡献，并推动人才培养评价从看重过程投入转向关注实际成果，注重学生毕业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能够更好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与动力状态^[4]。在此背景下，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特质：第一，价值判断与人文关怀：不仅关注形式与功能，更能从文化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在设计中传递价值；第二，前沿探索与批判思维：具备国际化视野及掌握前沿设计研究方法，能够开展创新的系统性实验，能对现有设计方式、技术应用与社会现象进行反思；第三，系统整合与跨界协作：能够把握技术、商业、用户等多重系统，善于开展跨领域、跨文化协作；第四，实践能力与社会转化：兼具创意构想能力及将设计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推动力，使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或商业价值。总的来说，这类人才应从“解决问题”转向“提出课题”与“构建生态”，成为能够塑造体验、系统和未来方向的战略型创新者。

作者简介：闫如山（1982-），男，山东临沂人，景德镇陶瓷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及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教改课题一般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五位一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

“双一流”评价体系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培养模式，但其导向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加强学术与实践的结合、专业与交叉学科的平衡、个人创造力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同时，“新文科”建设也推动设计学科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传授技能”转向“塑造思维”、从“服务商业”转向“引领社会”、从“单一学科”转向“学科交叉”。这一转变要求人才既要有专业深度，同时也要具备跨界整合能力，从而形成“T”型知识结构。可见，“双一流”和“新文科”建设都亟待培养具有价值引领、前沿洞察、跨界协作和实践转化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同时，要重视人才培养过程，强调科研成果的创新质量和贡献，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国际竞争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因此，传统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这一需要，必须重新思考人才内涵与培养路径。

2 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现实困境探析

当前，我国艺术设计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日趋扩大的同时，人才培养质量也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尤其在应对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上仍面临结构性约束与机制性障碍，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培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受工业化时代标准化教育模式的影响，当前的艺术设计硕士培养的相对统一的流程与创新人才成长所需的个性化、开放性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第一，现有培养框架统一化的教学安排往往难以兼顾学生在技术前沿探索、社会创新实践、理论深度建构等不同路径上的个性化成长。第二，跨学科教学多停留在课程拼接层面，尚未实现真正融合；部分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涵盖人工智能、可持续设计、社会创新等新兴领域，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与社会及学科前沿之间存在滞后。第三，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导师在应对跨学科、综合型课题时往往力有不逮；同时，随着培养规模扩大，导师指导精力趋于分散，容易陷入事务性管理或技术性辅助，在研究方法与学术思想层面的深层引导较为欠缺。

(2) 理论与实践环节的衔接不足

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真实、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实践情境，当前教学中理论传授与实践尚未形成有机联动，存在脱节现象：首先，学术型与专业型两类研究生在培养目标、研究方法与成果评价上缺乏有效贯通，导致理论研究往往难以转化为设计创新的推动力，而设计实践也常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支撑与反思深度。其次，尽管项目教学已广泛开展，但课题设置往往与实际需求脱节，缺乏真实性与挑战性，难以系统提升学生应对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学生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大多呈现表面化、短期化、片段化特征，国际化视野培养体系尚未健全，缺乏深度融入全球学术网络、持续拓展国际视野的有效机

制。

(3) 评价与激励机制的导向失衡

评价体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导向，目前尚未完全遵循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一方面，成果评价过于侧重量化指标与表现形式（主要依据论文发表、竞赛获奖等可见成果），致使学生在选题时倾向于回避周期长、风险高的探索性方向，而那些具备前瞻价值但不确定性较强的研究则易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现有评价偏重最终成果，对学生研究过程中的思维发展、协作能力、挫折应对等过程性评价环节关注不足，不利于学生形成持续反思与迭代的学术习惯。同时，现有激励多与最终成果直接挂钩，对研究过程中的试错、假设验证等环节缺乏应有的认可与支持，未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勇气，这在客观上抑制了学生从事前沿性、颠覆性探索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总体来看，当前培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涉及理念、结构、实践多个层面。其根本矛盾在于，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核心、具有一定固化倾向的教育模式，与“双一流”建设所倡导的以创新能力为中心、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新要求之间，尚未实现有效衔接。这种结构层面的张力，不仅制约了学生创新潜能的发展，也影响了设计教育对国家战略与时代需求的主动回应能力。

3 四维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构建

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设计学研究知识体系亟待进行重构，也必将促进设计学研究的理论建构^[1]。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仅停留在局部课程的修修补补，需探索一个面向未来、立足中国语境的整体性解决方案，从而进行一场深刻的转型及范式重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旨在探讨并试图构建“价值—前沿—跨界—实践”（Value-Frontier-Interdisciplinary-Practice, VFIP）四维融合培养模型（图1）。旨在推动从工业化“标准生产”到生态化“个性化培育”的范式重构，将孤立的培养环节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成长支持系统，催化拔尖创新人才从“潜在可能”向“现实涌现”的转化。

3.1 核心理念转型：从“标准塑造”到“生态营造”

VFIP 四维融合培养模型的核心在于将人才培养理解为“创新生态”的营造过程，而非技术产品的标准化输出。教育者角色需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生态构建者”，其核心任务包括：一是提供丰富的“养分”，即多元、前沿、可选择的价值引导、知识资源与实践机会；二是构建开放的“环境”，即鼓励跨界对话、协作探索、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与制度空间；三是激发内生的“动力”，即通过挑战性课题与个性化指导，点燃学生的好奇心、使命感与自主探索欲。这一生态不是放任

自流,而是通过精心的制度设计,“注重对研究生在批判性思维及创造性思维方面的培养与启发”^[6],为每一颗独特的“创新种子”提供最适合其成长的动态支持环境。

3.2 模型构建:四个维度的系统整合

基于上述理念,VFIP模型围绕四个相互渗透、彼此强化的核心维度展开构建,形成一个支撑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立体框架:

(1) 价值引领维度:构筑创新的意义根基

该维度强调设计创新必须建立在对文化传统、伦理规范与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之上。实施路径包括:开设设计伦理、社会创新理论等跨学科研讨课程;在设计项目中嵌入价值影响评估机制;围绕乡村振兴、数字包容等社会议题开展沉浸式工作坊。可以说,在新文科语境下的设计学科与教育,就要直面与全球共识相悖的社会问题,告诉我们的学生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主张,重塑生活风貌,要内修心、言、图、物、境,以正确的价值观来外化人、事、物、场、景^[7]。通过这些方式,培养学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诉求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2) 前沿洞察维度:培育研究的学术锐度

该维度主张强化设计学的研究属性,通过设立前沿讲座与研究作坊,聚焦人工智能设计、生物材料应用等交叉领域;实施“早期科研融入计划”,让学生在各级科研项目中接受系统训练;将设计研究方法论设为必修核心课程,培养严谨的学术思维。这些举措旨在提升学生追踪前沿、开展原创研究的能力。

(3) 跨界协同维度:构建创新的组织网络

突破专业壁垒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建议设立跨院系“创新实验班”,围绕智慧医疗、未来出行等综合议题开展项目制学习;为确保跨界协作的有效性,需配套推行“导师组”制度,吸纳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如设计、工程、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联合指导,从多维度深化项目探索;开设团队协作与领导力专项课程,系统培养学生跨领域沟通与系统整合的能力。例如,斯坦福大学d.school作为一个跨学科创新中心,其跨学科课程设置的核心使命是推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维在全校范围内的普及,它面向全校各学院学生开放,通过项目制课程,汇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共同解决复杂现实问题^[8]。因此,围绕着新型人才的需要,需要逐渐打破专业界限,构筑新知识体系与新的学习模式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自主学习导向,从单一的知识信息教学模式向知识持续成长模式转变^[9]。

(4) 实践转化维度:确保创新的社会效度

强调设计教育的社会嵌入性,通过与头部企业、地方政府共建“真实课题库”;设立社会创新孵化基金,支持优秀项目

落地转化;建立设计实践报告与学术论文并重的多元评价体系。这些机制保障了创新成果从概念到实施的全链条实现。例如,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依托数字文化创意智能设计技术重点实验室,与阿里巴巴、华为、京东、湖南广电等行业领先企业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引领产品、体验与服务的突破性创新^[10]。

3.3 系统特征:动态平衡与适应性演进

VFIP模型并非四个维度的机械叠加,而是一个动态平衡、螺旋上升的有机系统。“价值引领”是创新的方向舵与意义锚点;“前沿探索”提供创新的知识引擎与先进工具;“跨界协同”构成创新的组织模式与资源网络;“实践转化”则是创新的价值检验与实现场域。四者相互反馈、彼此强化。例如,一项关于可持续材料(前沿)的社会创新项目(实践),必然涉及与材料科学家(跨界)的合作,并深入探讨其环境伦理(价值)。

同时,该模型强调动态适应性,是为突破现有瓶颈提供了一套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与行动指南。不同院校、不同专业方向(如服务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工业设计)可根据自身优势与特色,对四个维度的具体内容、课程组合及实施重点进行差异化配置。模型提供的是一套通用的“原则”与“工具箱”,而非僵化的“蓝图”,鼓励各培养单位在遵循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开展富有创造性的本土化实践,这为各类院校开展本土化创新实践预留了充足空间,形成各具特色的一流创新人才涌现生态。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作为国内“双一流”设计学科建设的标杆,其培养模式体现了对VFIP维度的深刻回应。在价值引领上,学院将“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作为贯穿所有专业的核心哲学,通过“设计丰收”等长期项目,使学生直面城乡发展中的真实伦理与价值抉择;在前沿洞察上,学院设立了“人工智能与数据设计”、“创新设计与创业”等一系列前沿方向,并依托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等平台,将最前沿的科研动态迅速转化为研究生课程与课题;在跨界协同上,学院与同济的汽车、建筑、软件等强势工科深度绑定,通过“同济-阿尔托联合平台”等机制,将设计学生置于跨学科团队中,培养了出色的系统整合能力;其实践转化则紧密依托长三角的产业生态,许多毕业设计直接源于企业的真实研发需求。可见,VFIP模型的成功实施,必须依托学校整体的学科生态与地域优势,进行顶层设计与资源整合,而非设计学院的孤军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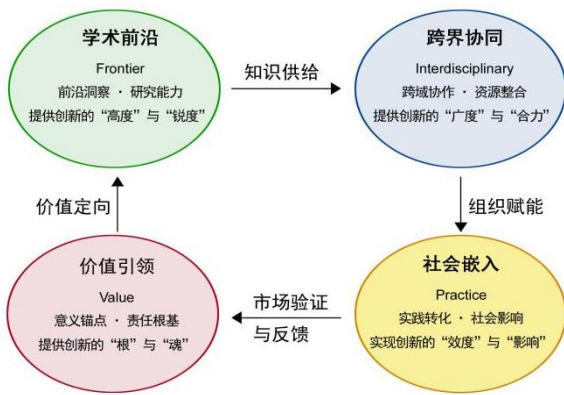


图1 VFIP 四维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型

由此可见，VFIP 四维融合培养模型具有双重意义，在理论层面，实现了从“生产逻辑”到“生态逻辑”的培养范式路径转型；在实践层面，提供了可操作的四维整合框架与实施策略。这为突破当前艺术设计研究生培养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有望推动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实现从“技术传承”到“创新引领”的根本转变。当然，任何先进的理念与模型，都需要坚实的制度与资源保障方能落地生根，其实施效果则有赖于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

4 支撑路径有效运行的机制保障

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不仅需要理念引领，更依赖于配套制度的系统支持。为确保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需对现有管理机制进行优化，确保理论构想转化为实践效能，重点从课程体系、导师制度、评价机制与资源配置四个方面展开。

(1) 构建动态开放的课程与项目机制

僵化且单一的课程设置是创新教育的首要障碍。建议构建“核心基础—前沿专题—跨界拓展—自主探究”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其中，核心模块夯实设计思维与方法论基础；前沿与跨界模块以工作坊形式快速响应学术动态；自主研究模块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这种“课程超市”模式打破专业壁垒，实现“一生一策”的定制化培养。例如，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专业的教师资源丰富，在设置课程时，可以加强艺术课程与工程技术课程的互通，使艺术设计师与工程师的交流更加畅通^[1]。同时，建立基于真实需求的“项目池”机制。由跨学科委员会负责征集来自产业、社会和国际合作的实践课题，形成动态更新的、基于真实世界问题的项目库。这类项目要求学生投入大量时间进行一手用户研究，综合相互冲突的需求，做出艰难的战略决策，并对整个过程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

(2) 完善跨学科协同导师与国际视野培养

在具体的跨学科合作中，不仅需要具体的课程设计，同时需要具体的方法工具的支持。单一导师已难覆盖跨学科创新的

知识版图，不符合跨领域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建立以跨学科教师、行业专家共同参与指导的“导师组”制替代单一导师，知识互补、行业互补，以适应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在国际视野培养方面，不能仅停留在“短期游学”，应着力拓展合作渠道，将导师进修、学生交换、课程共建的国际化建设协调推进^[2]；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与海外顶尖设计院校共建联合工作室、双学位项目，选拔优秀学生到海外工作室或研究团队中开展中长期研究，在真实的跨文化团队中提升其国际视野与跨文化协作能力。

(3) 推动评价体系向“过程+发展”转型

在学生评价方面，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从“成果导向”转向“过程+发展”导向的双轮驱动。可建立学生“学习档案”，收录初始选题、创意思考过程、团队协作到设计迭代、反思总结、成果展现的全过程，将其作为课程考核或毕业评价的重要依据，从而真实反映其思维演进与成长的轨迹。在毕业答辩与评优环节，引入更广泛的评审团群体，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行业代表甚至用户代表等共同参与评议打分，以实现多视角、跨学科的综合评价。评价标准包括研究问题的价值性、研究过程的严谨性，更强调设计方案的创新性及社会影响等。此外，也可另设“探索创新”专项奖励，旨在鼓励具有前瞻价值的高风险探索，为敢于突破常规的学生保留制度和发展空间。

(4) 优化奖励机制与资源配置

在奖励机制方面，可设立校级“创新研究基金”，构建贯穿项目全周期的阶梯式资助模式。该模式下由学生自主探索课题，即根据项目阶段与成果类型提供差异化支持，如初期的探索种子基金、中期的深化发展基金、后期的成果转化基金等，以鼓励团队合作与成果的社会价值实现；另外，将学生课题、设计实践、策展、专利等成果转化等纳入评价范围，形成多元、开放的成果认定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搭建校级“创新实践平台”，进一步设立跨学科资源预约与共享数字化平台，实现实验室设备、专业软件、数据库等实现线上预约及高效利用，同时也可以让设计专业的学生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进行合作，实现学科交叉与合作^[13]；建立“创新导师”资源池，容纳来自跨学科导师、学者、企业专家等人士，以线上咨询答疑、工作坊等柔性方式参与指导，形成结构多元、动态互补的指导体系。综上，以上措施为确保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可持续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有效支撑：课程和项目机制使学生通过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贯通和能力提升；导师机制有效支撑学生在多元语境下开展创新实践；评价体系将过程与发展并重，鼓励具有风险但富有价值的前沿探索；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为学生的创新活动提供保障和动力。这四个方面的举措有机衔接与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开放、鼓励探索、孕育创新的人才培

养生态与制度文化。在具体的跨学科合作中,不仅需要具体的课程设计,同时需要具体的方法工具的支撑。比如协同设计方法中的一些工具都可以在跨学科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设计过程需要实验手段的支持,技术运用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原型搭建与测试,设计活动是思维训练和动手实践的交叠过程,构建适合全校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在协同创新实验中心围绕同一目标项目进行共创是保障。

5 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与新文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聚焦于艺术设计类硕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议题,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深入剖析当前培养体系中的困境,试图构建面向未来的培养路径及保障机制,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当前语境下的艺术设计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内涵已经从传统的以单一专业技能培养为主,拓展为包括价值引领、前沿洞察、跨界协同及创新实践转化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而培养目标亦应从“技术传授”转向“战略创新”。第二,现行培养模式在目标、课程、指导、评价等环节均存在与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相悖的系统性矛盾,亟需进行范式层面的深度改

革,从而为个性化创新种子的成长提供动态、开放、支持性的环境。这同本研究提出的“价值-前沿-跨界-实践(VFIP)”四维融合培养模型高度契合——核心理念是从“标准化塑造”转向“生态化孕育”。同时,我们也要“鼓励一种多元的教育生态,毕竟各个学校发展阶段、发展特色、发展动力都是不同的”^[4]。第三,为确保该模型有效运行,研究进一步设计了四大关键保障机制:包含动态课程生成、多学科协同导师制、发展性评价及激励性资源整合,各项机制相互衔接、协同作用,将分散的改革举措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培养生态。总之,本研究的理论构建与机制设计,不仅为艺术设计类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具体的改革框架与实践路径,更呼应了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学科交叉、价值塑造与社会服务的根本导向,体现了“双一流”建设中内涵式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未来,该培养模型与机制的有效性尚需在多元高校语境中进行持续的行动验证与动态调适,但其指向的核心方向——即从工业时代的标准化教育范式,转向创新时代的生态化育人范式,这或将为我国艺术设计乃至更广泛的新文科领域的研究生教育改革,贡献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系统思路。

参考文献:

- [1] 黄宏伟,王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同济大学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理念与举措[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05):10-15.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EB/OL].(2023-05-29)[2023-07-09].
- [3] 何洁,刘德坤.温故知新一—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回顾与思考[J].艺术教育,2024,(02):30-34
- [4] 黄洪兰,姚玉香.质量革命: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J].现代教育管理,2020,(12):7-14.
- [5] 李超德,温静.学理逻辑危机中“设计无学科”理论的设计学研究困惑[J].艺术设计研究(中英文),2025,(06):78-85+140-141.
- [6] 刘庆红.“双一流”建设语境下如何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与斯坦福大学国际与跨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GARY MUKAI 博士一席谈[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05):62-67.
- [7] 宋建明.宋建明:新文科建设语境下的设计学科建设的深度思考[J].设计,2021,34(12):64-67.
- [8] 洪吴迪,罗菁.生成式 AI 时代设计师身份的变迁与设计教育变革[J].艺术设计研究(中英文),2025 (06):92-98+141-142.
- [9] 潘长学.潘长学:设计学学科建设的学理方法和武汉理工大学设计学学科建设实践[J].设计,2021,34(12):60-63.
- [10] 季铁,闵晓蕾,文航轩.数字文化创新的知识生产与生态构建[J].包装工程,2025,46(06):1-15+585.
- [11] 潘长学.综合性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思考[J].艺术教育,2020,(07):14-16.
- [12] 刘强.艺术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实践探索[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0,2(07):145-146
- [13] 邓嵘.知识结构转型与培养路径思考——以江南大学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改革为例[J].装饰.2021(06): 40-41
- [14] 娄永琪.AIGC 时代的设计与教育创新[J].艺术与设计,2023,1(04):166-172.